

编者按:文艺评论是文艺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文艺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文艺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部署,推动了文艺评论工作的深入开展。但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随着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与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整体态势相比,文艺评论工作中存在诸多与现实需要不相适应的环节,制约着文艺事业的进一步健康发展。要改变这一状况,除了从国家政策层面加以调整和扶植外,文艺界特别是文艺批评界加强学术反思和理论总结就显得十分重要。6月26日、27日,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重镇,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适时召开了第二届全国青年文艺论坛,王文章、李准、阎晶明、陆建德、白烨、吕品田、贾磊磊、陈飞龙、陈晓明、李陀、祝东力、刘继明、梁鸿鹰等资深批评家和赵文、邵燕君、李云雷、孙佳山等数十位青年学者和批评家,针对当代文艺批评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和深入探讨,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在此,我们特别刊发此次会议的综述文章,以期引起更多学者和批评家的关注和思考。

探索文艺评论的新方向与可能性

——第二届全国青年文艺论坛综述

本报记者 杨晓华

6月26日、27日,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主办了第二届全国青年文艺论坛。论坛的总主题和第一单元的主题是“文艺评论:新的方向与可能性”,第二单元的主题是“新时期以来文艺评论的回顾与反思”,第三单元的主题是“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与当代文艺评论”,第四单元的主题为“当前文艺评论的现状与前沿问题”。5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专家,围绕论坛的主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和辨析。

当代文艺批评面临的挑战

文艺评论是文艺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文艺评论通过理性的选择、分析、评判,发挥着对文艺作品进行深度鉴赏、价值呈现、理论总结、方向引导等重要作用。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艺批评家在促进文艺的创作和繁荣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但是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文艺创作的整体生态发生了迅速而复杂的变化,在这种新的发展态势面前,文艺批评显得滞后和乏力,与本能发挥的地位和作用很不相称。因此,文艺批评界就新形势下面对的 Challenge 和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刻的学术探讨和理论反思。

针对当代文艺批评面临的形势和挑战,出席和参加论坛的资深专家和学者从不同角度表明了看法。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指出,文艺评论是文艺整体生态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文艺评论要关注新的现象,要深入把握新时期的特征。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人已经走在文艺复兴的伟大道路上。在这样的时期,文艺界有伟大讲述出与以往不同的中国故事,而这正是开展一切文艺批评的出发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以中国当代文学为例说明,当代文艺生态已经发生结构性的改变,呈现出新的混杂性和多样性。他认为目前文艺批评面对的态势是以缩小的批评面对扩大的文学,传统的批评面对崭新的生态。北京大学教授邵燕君以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为依据,从媒体哲学的角度对文艺领域的深刻变化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在新的网络时代,人们的感官平衡出现了更高的系统性整合,传统的印刷文明面临终结,但是印刷时代形成的一切关于文学的标准和审美习惯,并非都要废弃,而是要引入新的尺度,把新的感官平衡和比例的变化引入到判断标准中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阎晶明以体育传播为例,形象地说明了当代文艺批评面对的的全新文艺生态和媒体环境,他认为文艺批评必须随之调整和改变,否则难以重塑批评话语的权威性,并有效地介入文艺生产。

针对当代文艺批评发展的可能性,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准认为,应该确立最具有普遍意义和时代特征的热点和前沿课题,开展深度讨论。他举例说,文艺的本质属性及其与市场的关系、全球化中的普世价值与民族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人性问题的讨论、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想资源等,都是值得重点讨论的大问题,有的问题直接为文化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基础。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前所长、《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主编陈飞龙呼吁,通过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西方文艺理论加以科学分析,以社会

主义文艺的立场,引领和规范文艺创作。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吕品田对文艺批评中是否需要坚守批评立场的问题进行了廓清,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是社会化的阅读行为,因此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必须在社会化的文学活动中体现社会意识形态及其发展形式,体现社会主导价值观和主流思想。中国作协创作部研究员梁鸿鹰强调,文艺批评家应注重改变纯学究样式的书斋生活,努力纠正言说不由衷、感情不饱满、写作不投入、批评文字和批评对象不对称等不良现象,提高文艺批评的声誉。《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文艺评论家施战军也认为,当代文艺及其批评缺少了对现实、历史、时代的关注,缺少向历史现实或者时代冲锋的力量,感染力大大消退,作家和批评家应该走到生活的深处,寻找激发文学成长的希望和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认为中国正处于从熟人社会向陌生化社会转化的过程中,文艺创作和批评应该探讨新的共同体中的普遍价值,讲好中国故事,以感动中国和世界读者。沈阳师范大学教授、文艺评论家贺绍俊认为,文学批评必须加强伦理自觉,增强底线意识,减少对实质性的文学活动的伤害。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认为当代文学批评已经呈现了多元分化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探讨中国经验的可能性,需要广泛面对东西方文艺理论的知识谱系,并把民族性本体深藏于文学的表达之中,才能引起广泛的共鸣。《文艺研究》杂志社主编方宁认为,在思想多元的时代,文艺批评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标准的丧失,因此健康的文艺批评应该起到建立制度和标准的作用,以最终促使新的文艺秩序的生成。

新时期以来文艺评论的回顾与反思

要清晰地理解当下文艺界的现状,必须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时期文艺批评的整体状况进行分析和理解,以便更深刻地认识当下现状的历史起源和发展逻辑。与会的青年学者们就此论题展开了讨论。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祝东力通过自己的思想历程,反思了新时期文艺批评的变化过程。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文艺批评也像政治一样经历了一个拨乱反正,随后在1985年前后,开始进入方法论的革命时期,大量的西方文艺思潮涌入,文学、美术、电影都基本上同步开始以西方的先锋派、前卫艺术为样板来进行中国文艺的思考和创作。这一局面在进入90年代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福民认为,上世纪80年代的确出现了文学和社会积极互动的时期,但是很多批评者没有从那种美好记忆的门槛中迈出来。80年代的文学批评是比较传统的方式,存在一个设定的价值系统,这种方式在80年代的中国得到了反映。但是这种方式19世纪中期以后就在西方世界结束了,新的文学批评成为一种专业,甚至

是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相匹配的文学产业。我们的文艺批评也因为90年代的社会变化,“学术凸显,思想淡出”,要求文学批评的理性知识表达,这样,我们的一整套价值系统也随之被掏空了。清华大学教授旷新年认为现代文学观念受到了现代资本主义民主、自由价值观和民族国家兴起两种力量的支持。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从西方现代文学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学中汲取过力量,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一种价值的混沌和重建的时期,民族国家在受到侵蚀,传统的文学形态也在走向没落,这一价值重建过程遭遇困境,但如果中国要真正崛起,文学必须承担重建共享价值的功能。

上海大学中文系周展安博士则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载体发生变化,但它的逻辑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最根本的还是怎么去谈文化和价值观,怎样来把握今天的中国现实。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真正问题,是西方理论已经无法帮助我们认识周围现实。著名作家、评论家刘继明认为,无论是从中国社会的发展,还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发展来看,当前都处在重要的转折点上,批评家面对这样的时代发展,语焉不详、含混暧昧地进行着一种形式主义的批评,实际上丧失了与社会现实的对话和介入,还必须创造一个他者,这种他者一个来自于西方,一个来自于第三世界,比如非洲,从这种对比的视角中去定位批评的维度。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慧瑜从分类学的角度,对20世纪90年代后批评的话语形态进行了整体性的梳理,他认为革命批评、学院批评、媒体批评,分别代表国家体制、知识分子和资本市场三种力量,相互倚重,共同支撑着当下的批评现状,但是这三种批评都受制于自身的利益区分,难以具有公共性,因此应该提倡一种借重媒体力量的公共性批评。

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与当代文艺评论

当代文艺评论出现的种种问题,一方面牵连着文艺批评本身在历史中的逻辑展开,同时也和文艺批评本身所关涉的思想资源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当代文艺批评如何正确地审视西方文艺理论,如何从中国经验中提炼价值标准,这是开展文艺批评的重要基础。

首都师范大学卢燕鸥博士认为,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生命力在于实践哲学,实践地改造世界的意义不仅在于面对当下,而是要创造出推动世界前进,回答历史发展可能性的框架。美国西北大学美术史系博士生物肖认为,在这个信息化时代里,我们不可能脱离全球视野来谈本土经验。但是这并不等

于认同西方价值观或者等同于西化,也不是一定要建立一种非此即彼的逻辑,事实上从20世纪初期,中国艺术家早已开始在世界资源和本土经验之间寻求推动本土民族艺术的发展,这一历史趋势需要在当下的艺术实践中进一步延续和展开。

陕西师范大学赵文博士认为,文学批评的基本任务是建立一套新的价值体系,面对西方的文学理论,我们今天本应该更多自信地去和它进行正面的对话,以建构我们的整体价值体系,但是西方的话语系统已经打散了我们对话的基点,使得我们难以回到自己的价值资源,这无疑是一种困境。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张永禄认为,对待西方的文艺理论,我们不应该怀有偏见,而应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心态对待,把它作为照亮我们前进的灯光,作为可资借鉴的资源看待,但是理论本身不能构成批评,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发声。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苏仲乐认为,西方理论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包括人们的思想的塑造,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应该从问题意识出发,真正把西方理论作为我们的思想资源,面对中国经验,认识中国经验。上海交通大学尹庆红博士介绍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大众批评的文化背景,他认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其任务就是推动大众文化的解放。从18世纪以来批评这个词的出现,一直到19世纪现代批评的脉络的出现,是跟资本主义或者资产阶级社会公共领域的兴起是密切相关的。在今天这个时代,作为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一定要介入公共领域,促进大众文化的解放,追求大众的美学原则。

张慧瑜认为,新世纪以来法律界、社会学界或者政治学界认为西方理论和中国经验是他们写作的规范,下面才是中国经验的阐释,他们不会去质疑这个前提。但是80年代以来我们学的,或者说引进的西方理论很大程度上带有后工业社会的特点,用来阐述当下的中国经验,非常不合适,因此要提出符合中国经验的概念、理论、认识或者是框架。周展安认为,在表达中国经验的时候,会有一个多元主义思维的支持。多元主义支持特殊性的说明和确认,但是并不处理不平等问题,多元主义复制了民族国家的内部的差异性,实际上是一种封闭孤立的思维模式。因此中国经验不是多元主义上的特殊,也不是一般的普遍性,而是要找到特定时代的矛盾结构和阶级结构,从而动态地把握当代艺术的主体特征。祝东力认为,在中国经验的创造上,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思想的系统论述,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就是在一个政治经济全民共享这个平等的制度的框架下,真正文化多元,文化平等才能有能。

当前文艺评论的现状与前沿问题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孙佳山认为,文艺批评的前沿问题应该包括两个维度:一是文艺评论和新媒体的关系,最为突出的就是,

无论电影、电视、音乐,还是动漫、网游,包括我们的舞台艺术,互联网既是传播渠道,更成为了物质载体,它们都被互联网所重新塑造和定义。在这一历史趋势的背后,新一波工业革命已经出现在了历史地表,其实就意味着文艺评论要面对新一波工业革命的时代挑战。第二是文艺评论与新现实的问题,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正在生成新的经验,但是也出现了从《蜗居》到《小时代》的文化表征,作为一种高度分裂的体验,我们的价值观、情感模式、情感结构,甚至我们最基本的认知方式,都受到新现实的冲击,甚至被其决定。

哈尔滨师范大学徐志伟博士认为,今天的文学批评如果想获得有效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寻找到自己的思想脉络和问题意识,能够参与到总体性问题的生产当中去,寻找到现在问题和文学问题的交叉点,寻找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相通的地方。今天的文学批评的独特性,应该是参与到属于中国的这麽一种整体性价值原则生产的过程中去。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龙分析了当前文艺批评的体制化问题。中国在过去100多年逐渐的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也逐渐地引进了现代的学科体系。今天不同的学科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基本范式、研究方法、概念系统,这种体制可能构成了思想的限度,有时候难以超越。首都师范大学陈国战博士认为,从事当代文艺批评要注意区分大众文化的批评和文艺批评两种不同的标准。中国的大众文化批评系从西方借用过来,但没有像西方倡导者那样进行政治和社会批评,而是转入审美领域,但其实中国当前大众文化表现出的突出问题并不是三俗问题,而是价值观的误导。中国作协《长篇小说选刊》杂志社副主编鲁光博士对一些批评家表示异议,他认为底层文学刚出来的时候真正的生活状况就是沉重的部分多。他进而认为,知识分子要警惕自己生活安逸之后,对下层的苦难的淡忘,对既有的秩序的不合理辩护。中国传媒大学凤凰学院吴文博博士从电视媒

体和文艺批评的角度提醒大家,对电视艺术的批评,应该把自己的理论视野整体迁移,不是等一个节目出现之后再去找批评它,而应该帮助确立节目的核心,这就保障了文艺批评站立的制高点。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副所长宋宝珍认为批评的目的就在于知识分子运用自己的专业的知识,对于批评对象发表基于个人立场的有效见解,这种见解不是建立个体权威,不是建立自我话语的绝对的引领地位,而是在最大程度上促进人类思想的自由,在于提供一种合理的艺术的选择,而帮助人们不会对于一种话语权产生被动的认同。

著名文艺批评家李陀在发言中提出,从事当代的文艺批评要注意对知识来源的反省,要注意批评目标、任务、方法等的历史性。他认为,进行文艺批评要注意从大的时代背景中去理解作品,其中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解就是一个大问题。他认为,今天的文化消费或者建立在当代规模宏大工业基础上的文化,比科学技术更重要,更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合法性、合理性的物质基础。这样一个宏观的文化研究,对于具体文艺作品的分析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海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文艺评论家刘复生认为,所谓的中国经验其实已经在内包含了西方的经验,包括所谓西方的理论,所以对于中国经验和西方理论关系的反省意味着我们中国人在自我意志内部的一场搏斗。这种反省的历史过程不可避免要经过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用西方的理论来阐述中国的现实;第二个阶段自我迷失,用中国经验来讲一个西方的故事;第三个阶段就是用西方的理论来讲中国的故事,大概对应2000年左右;第四个阶段就是用中国理论来讲中国故事,这个阶段还没有来到;最后一个阶段是用中国的理论来讲世界的故事。即使现在我们对于中国经验的讲述也已经具有了世界性的内容。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祝东力在论坛的总结发言中认为,当代文艺批评面临的主要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作品已经不再是一个公共话题。在这样一个生态格局当中,文艺评论作为一个具有特殊的理论自觉意识的文艺部门,有能力走在创作的前面,作为一个助产士来引导文艺的发展。他认为此次论坛通过分论坛主题的设置,既总结纵向历史经验教训,也审视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的横向参照,最后则是对现状和前沿的探索,这些主题的讨论支撑了总议题,将大大有助于对文艺评论新方向和可能性的探讨。

“青年文艺论坛”简介

2011年6月,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组建了“当代文艺批评中心”,此后每月举办一期“青年文艺论坛”,对当前文艺热点问题专题研讨,努力使学术理论和知识重新针对现实、回到现实,将关于具体文艺作品的评价放置在更为开阔的理论和历史视野中予以理解,力图站在中国文艺发展的前沿,准确地把握其时代特征,从而在整体上分析当代文艺发展的趋势和规律。经过整整3年的不懈努力,“青年文艺论坛”已经摸索出了一整套符合学术自身规律,特别是适合成长中的青年学人思想特点的学术研讨机制,在重视思想导向的前提下,积极调动他们活跃的、创造性的思维,并于2013年12月成功在京举办第一届全国青年文艺论坛,2014年6月在京举办第二届全国青年文艺论坛。

“青年文艺论坛”以当前文艺的热点和前沿问题为中心,从现实的社会经验与文艺经验出发,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在讨论中深化、更新认识,探索文艺发展的新思路。如今,借助全国青年文艺论坛这个文艺批评的常设机制和平台,青年批评家们通过对当前中国文艺领域的新作品、新现象、新趋势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旨在推动重建一种具有中国精神和中国美学特色的新型文艺评论。这是“青年文艺论坛”的探索,也是年轻一代的担当。

传递正能量

在传统儒家学者的观念中,都把人类古代社会看作是人类文明的辉煌时代。他们认为三代时期,人们思想质朴、民风醇正,人与人之间少有野蛮与欺诈,冲突与纷争、战争与屠杀、恐怖与暴力,以及诸如如此类的各种有悖文明进步的行为。现实历史发展证明,三代的清明世界毕竟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为了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足够的信心,儒家又提出了历史的进步次序,希冀历史能够从据乱世升到升平世,再进入到太平世。时至今日,我们用儒家的观点来反观现实,太平世界似乎离我们还是非常远。但是儒家以高度自觉的道德自信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方式,仍然留给我们许多反思与启示。

世界范围内人为的民族矛盾与对抗、政治博弈与冲突、军事对峙与战争、贸易竞争与摩擦、宗教恐怖与屠杀、环境污染与破坏等灾难性事件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在现代媒体的时代,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会在第一时间目睹这些事件发生、进展的全过程。人类的心灵在受到这些灾难性事件冲击的同时,似乎也渐渐失去了对人类自身文明状态的期待与向往。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

人类出现的各种灾难性事件,都与人们缺乏基本的道德自信直接相关。面对这样的局面,呼唤人类的道德自信迫在眉睫。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儒家的大同社会,到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再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人类一直葆有较为强烈的道德自信心,憧憬着美好未来社会

人类善治的目标主要包括,经济活动的自由、政治生活的有序、社会大勢的稳定、文化发展的持续、生存环境的和谐。这五个方面相相依存,道德自信的能力贯穿于其中。

自由的经济交往可以满足人类物质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充满活力的经济一定是自由的经济。自由的经济

运行,就能够保证社会政治生活的有序完整。政治权力的结合无论采取哪种形式,都应该符合善治的道德理念。可以说充满道德自信的政治才能够是好的政治。

经济自由和政治有序,是社会大勢稳定的前提。一个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社会是对人们生存的最大威胁。社

大体稳定的社会不仅要求经济、政治领域的自由和有序,在人们物质和制度生活之外,精神领域的自由创造则更加凸显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让每个人平等地接受教育,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才能,全面地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这是一个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最好体现。繁荣的文化可以促进人的身心健

康,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文化积累所形成的文明成果可以供全体人类共享。

人在人类文明进步的道路上,欺诈、压迫、剥削、暴力、恐怖、屠杀等灾难都可能因为文化创造能力的激发而得以避免。文化发展既包括知识的积累、科学的创新、技术的革命,也包括道德精神的提升和道德能力的进化。前者必须在后者所提供的道德原则的规范下才能够走上合乎人类生存需要的发展之路。各种违背人性需要的知识、科学和技

呼唤道德自信 促进人类善治

戴兆国

的设定。在这种道德自信的推动下,人类不断探索自由、民主、公正、繁荣和平的发展道路,进而实现善治、合群、优良的社会。以社会形式存在的人类群体,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如何解决这些冲突,需要人类的智慧和能力。发挥人类的智慧和能力,离不开人类的道德自信。道德自信是人类面对和处理现实社会矛盾表现出来的理性能力。这种能力是促进人类善治的基本能力。

交往需要诚信的道德作为保障。对于现代社会经济而言,充分的市场交往必须依赖一定限度的诚信道德的维护。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交往更是如此。任何强权对经济交往自由的干预,都会导致人类生产能力的下降,破坏甚至动摇人类生产生活的基础。政治生活的有序,是保证社会权力系统的合理运行。人类群体的结合总是离不开权力体系的控制。但权力不是用来欺压和恐吓权力约束的对象,权力在公正的范围内

会大勢的稳定,需要以尊重生命为最高的道德原则。生命至上,人的生命权至上,坚守这一道德理念,必须对任何试图违背和破坏经济自由、政治有序和社会稳定的言行进行抵制。遵从生命原则,一切借口发展经济、政治而做出的对人的生命的牺牲和亵渎都有悖于人类的道德自信。尊重、爱护、保护、发展所有人的生命,应该成为人类群体或国家的最高追求。这是人类道德自信的最为直接的社会表现。

康,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文化积累所形成的文明成果可以供全体人类共享。在人类文明进步的道路上,欺诈、压迫、剥削、暴力、恐怖、屠杀等灾难都可能因为文化创造能力的激发而得以避免。文化发展既包括知识的积累、科学的创新、技术的革命,也包括道德精神的提升和道德能力的进化。前者必须在后者所提供的道德原则的规范下才能够走上合乎人类生存需要的发展之路。各种违背人性需要的知识、科学和技

术,可能是人类遭遇灾难的祸根。知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必须要以足够的道德自信为基础。人源于自然,复归于自然。这决定了人不能肆意破坏生存的环境,人要以高度的道德自信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此,人类应当自觉自己为宇宙万物之子,而非万物之灵,更非万物之主宰。人要保持对自然万物的敬畏之心,以谦卑的道德心态,自觉担负起陪护、看护和养护自然的道德责任。敬畏自然就能够善待自然,善待自然才能够与自然保持和谐共存的关系。改变自然能够无止境地供养人类的观念和看法,改变对自然能够无止境攫取的心态和做法,我们才有可能创造和谐的生存环境。

自由的经济交往,有序的政治生活,稳定的社会大勢,繁荣的文化发展,和谐的生存环境,离不开人类积极的道德自信。当每个人都能以诚信、平等、公正、共生、和谐的道德要求自己,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群体、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关系,满怀做人的道德自信,各种非文明、反文明的言行就会慢慢退出人类活动的舞台。人类善治、合群、共生、稳定的生存状态就能够到来。